

中国 特色道路探索

仇裕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特色道路探索

仇裕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道路探索/仇裕国著. —北京: 军事
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80237 - 389 - 1

I. ①中… II. ①仇… III. ①中国特色 - 社会主义建
设模式 - 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0295 号

书 名: 中国特色道路探索

作 者: 仇裕国

责任编辑: 邢 扬

封面设计: 王明全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389 - 1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销售热线: (010) 62882626 66768547 (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储运部 (010-66767383) 联系

前 言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道路问题空前突出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17 世纪中叶，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浑然不知自身腐朽没落的时候，欧美一些国家已开始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确立起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摧枯拉朽式的工业革命，使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虽然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令世人羡慕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这个时候却不得不面对辉煌已成过去、昌盛走向衰败的残酷现实。与新兴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的历史车轮放慢了，甚至停滞了，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

落后就要挨打。19 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强行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这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在近代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反复蹂躏欺侮和封建专制政权的残酷统治压迫下，国家丧权辱国，人民生灵涂炭。

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中国人民从不甘心低头，义无反顾地高举

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一代代民族先进分子身先士卒，前仆后继。魏源等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都是为救中华民族于危难关头而谱写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英雄壮举，虽然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但是，终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命运。辛亥革命后，又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封建读经逆流，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这时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仍然是一幅幅令人悲愤的景象。

中国人民在遭难，在抗争，在忧伤，在彷徨。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才能走出一条摆脱苦难、实现振兴的道路？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大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人，也给彷徨中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破天荒地吧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生机勃勃的现实。俄国革命实现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如一剂猛药，唤醒了世界尤其是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似的东方大国——中国等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苏维埃这样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独立自主的崭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于苦闷、彷徨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出路，给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中国道路问题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以新的思想方法和革命道路的启迪。

这个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往救亡图存运动失败的教训，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益深入人心，深深教育和影响了中国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导中国新的民

主义革命，进而奔向社会主义伟大前程的历史重任。一个共识正在形成，一个目标正在确立，那就是，走科学社会主义的路，走俄国人的路，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是中国经历长期艰难探索得出的历史结论，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道路该如何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答案，外国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方案。各有各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如何搞，具体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具体确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战无不胜，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又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认识总结，在认识总结中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探索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了日益广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一切方面。本书是作者结合课题研究，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理论和实践的专题性学习研究成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党在成立初期对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探索	(1)
一、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
二、在大革命实践中探索革命具体问题，提出革命的 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思想	(5)
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6)
四、提出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 建设的理论	(27)
五、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30)
第二章 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34)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34)
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44)
三、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 丰富和发展	(59)
第三章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	(72)
一、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	(72)
二、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	(89)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95)
第四章 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104)
一、毛泽东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轨迹	(104)
二、毛泽东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成果	(107)

第五章 邓小平经济社会发展思想	(124)
一、审视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三大视角	(124)
二、探寻和谋划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方略	(132)
三、邓小平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的价值意义	(150)
第六章 中国的对外开放与邓小平的开放性思维	(158)
一、确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以非凡的 气度打开国门	(158)
二、率先倡导设立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	(163)
三、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168)
四、大胆吸纳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	(172)
五、塑造改革开放的形象	(175)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及其中国化问题	(179)
一、发展中的问题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远见卓识	(179)
二、世界有识之士的觉醒和我国发展方式的科学选择	(185)
三、可持续发展的一般特征及其中国化问题	(189)
第八章 巩固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198)
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198)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权的根本宗旨	(203)
三、科学界定和充分发挥新时期的国家职能	(207)
四、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	(214)
第九章 抱定信念不动摇	(220)
一、矢志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220)
二、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225)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30)
四、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236)
第十章 弘扬科学精神	(244)
一、科学精神的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	(244)
二、以科学精神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发展	(254)
三、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	(260)

第十一章 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268)
一、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	(268)
二、党的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及含义	(271)
三、按照以人为本理念治国理政	(274)
后 记	(277)

第一章 党在成立初期对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探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深入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和革命道路的认识。这些认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至1921年春，先后成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确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与中国以往其他政党不同，它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并且有坚定的革命决心。但这时党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先驱》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

1921年底至1922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以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势头，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混乱。这些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这给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以实际的教育。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展，也直接涉及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性问题，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明革命斗争方向。

正在这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和把握。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为大会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支持这

些革命运动，并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贯彻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号召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先驱》等报刊上登载列宁著作的译文或介绍列宁有关理论的译文，同时成立秘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列宁著作的中文译本，如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策略书》、《伟大的创举》、《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并出版了介绍列宁生平的《列宁传》。列宁的思想和这次会议的内容对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把握中国国情，酝酿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4月底5月初，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召开广州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基本精神，酝酿建立国共统一战线问题，并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积极的探索和酝酿。6月，依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针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国内各阶级的政治动向，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会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和动力等问题，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人民就不能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此，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与此同时，对国民党作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中国现有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作斗争。这次会议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大会指出，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也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主主

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不可超越的一个阶段。大会提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痛苦，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发展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基本弄清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问题。这是以往的民主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情。除了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开始采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所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全新的革命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党的二大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党在此时的认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也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发展公式而得出这种看法，但这个公式对中国革命是不适用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还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应当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从而种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子。这反映了党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

从1922年到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先后掀起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高潮。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初步显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威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

二、在大革命实践中探索革命具体问题，提出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思想

党的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共同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气势磅礴的大革命，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人投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斗争实践，积累了许多新鲜而生动的革命斗争经验；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新问题置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要求他们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到党的四大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已经比较明确和完整地提了出来。

（一）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

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第二步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当时并没有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比较明确的区分。为了将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欧洲“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相区别，陈独秀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概

念，指出国民革命既不同于“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资产阶级崩坏时”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他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国民革命”这一概念被中共三大所采纳。但是，他仍没有对国民革命的内涵作出正确的说明，没有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严格的区分，因而导致了“二次革命论”，即认为国民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先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待工人阶级力量壮大了，条件成熟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他仍没有摆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窠臼。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国民党右派言行的猖獗，如何正确地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中共四大对此作过分析，指出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客观条件定之。这种分析，无疑比陈独秀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民主革命的前途如何，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回答的是毛泽东、瞿秋白等人。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谈到民主革命性质时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性质不同；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①。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亦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②这种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②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他在《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还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敌人妥协，因此，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革命时代、革命对象、革命的主体力量、革命的目标等许多方面，初步将国民革命同过去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区别，从而为党以后进一步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探索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两大突出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是欧美列强在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危机以后，在远东又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在中国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较顺利发展的条件又完全丧失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直接感受到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激起了反帝情绪的普遍高涨。二是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那时，控制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主要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它们处于分裂状态。1920 年发生直皖战争，1922 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 年又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各派都有帝国主义做后台，南方的一些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或有联系的地方军阀同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之间的战火也一直没有停息。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连年处于战乱中的省份，人民连生命财产的起码保障也无法得到。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阶层的强烈的共同需要。然而，要实现这种愿望是异常艰难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

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广大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参加这个统一战线，因为它们也深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痛苦。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正是从这种情况

出发，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样做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都是有利的。这样做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从而使国民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新的生命，也有利于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的天地中接受锻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开始表现出来。陈独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阐发了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必须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他对中国各阶级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这些就构成了陈独秀对于国共合作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而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发表了与陈独秀不同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但是革命的伟大势力，而且要起领导作用。瞿秋白1923年5月提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① 这些

^①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